

●笠翁谈东瀛

翻案与恶搞

李长声

翻案,这个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日本人也用,但意思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学的,相当于改写。

还处于蛮荒时代,大海的彼岸就有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给他们养成了拿来主义及模仿的本事,翻案也是其一。先是翻中国文学的案,近代以来翻西方文学,但也继续翻中国文学,其一是《水浒传》。

1757年日本翻译了《水浒传》,是冈岛冠山的遗译,叫《通俗忠义水浒传》,不懂汉文的人也可以受用中国名著。十一年后,1768年北壶游率先翻案《水浒传》,名为《湘中八雄传》,从此《水浒传》发展为两个系统,中国原装和日本仿造。仿造也越来越好,1773年建部绫足印行《本朝水浒传》,曲亭马琴评之:“其大意模拟《水浒传》,但不蹈袭《水浒》旧辙,另立一趣向,当时作者所不及也,实为今读本之嚆矢。”所谓读本,是江户时代的小说类型之一。引进了西方的文学概念与标准,读本等传统小说被否定,乃至衰亡。《水浒传》翻案小说接连上市,统称“水物物”。日本人说“三国志”,犹如他们说“三国”,说“水物物”则如同“水浒”。曲亭马琴一辈子写“水物物”,集大成就是《南总里见八犬传》。翻案当然要改头换面,也就是与当地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至于不能脱胎换骨,虽然日本人颇有文化自信,但最终还得由《水浒传》的本人家评说。

毕竟对别人的古典敬而不畏,更可以

拉大旗作虎皮,任意用自己的理解改写《水浒传》早有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柴田炼三郎的《我等梁山好汉》,杉本苑子的《悲华水浒传》等,近有北方谦三的《水浒传》,一个比一个现代化。杉本说:“《水浒传》往往被当作聚义在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收拾皇帝身边的佞臣们的痛快故事,但其实是讲述任何英雄也斗不过权力。”北方说他的主题是重写古巴革命,这说法还是交给评论家去诠释吧。

北方谦三这一代作家不具备汉文教养,读《水浒传》译本读来的就只有故事。他改动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常识的“逼上梁山”和“受招安”,这表明日本人与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不同感受及认知。王进这个人物没有上梁山,教过史进拳脚就从书中消失,但到了北方笔下,王进在山里办“黄埔军校”,传授武功,他的母亲教导礼法什么的,为梁山输送人才。山寨靠什么活?北方认为不能靠打家劫舍,把童威兄弟贩卖私盐编排为梁山的经济来源。至于宋江被写成好色之徒,则纯属“恶搞”。北方的翻案很是受了陈忱《水浒传后传》的启发。

北方谦三志在克服《水浒传》原著的“决定性弱点”,但才过几年,就感到自己的东西“应反省之处很多,被悔恨之情袭扰”。看来也需要有人来翻案,遗憾的是如今有著作权法,不能把人家“有魅力的故事改写成自己的作品”。

藏在江湖之远

——读《傅雷家书》

温海宇

《傅雷家书》早在几年前的一个选本里已经读过一些,现在是重温了。

再次庆幸没有错过如此之好的文字。这个“好”字绝不是概念化的笼统归纳,而是一种无比的深刻。它的价值是多视角的:可以当作史料来研究傅雷,可以当作教子法典加以效仿,可以当作一本艺术教材取其精见,亦可以当作父爱的典范永久收藏。那些真挚的语言实在很动人。傅雷的文笔一如他的译作,是那样的简洁而意味深长,那样的精确而富有张力。说它是一篇篇短制精美的散文也不为过。

然而它的形式还是书信。这一封封的书信远过重洋,传递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切希望,这书信给远在异国他乡的傅聪多少心灵的慰藉和艺术的滋养,是书信把父亲的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这些书信大都诞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的傅雷已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身心的处境可想而知,有所宽慰的是竟然得到能与同样是身蒙恶名的儿子进行通讯的优待,这在傅雷也算是一丝心情上的亮色。傅雷除翻译事业外,几乎把所有的时

间和心血倾注于对儿子们的培养。他首先是一个严厉的父亲,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对儿子们有着规范的要求,甚至苛刻和不近人情。正是这样的要求使得傅聪多年后的回国依然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的身上没有奇装异服,更没有长发蓄须和颓废的所谓艺术家的做派。足见傅雷的言传身教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多么的富有成效。更重要的是对傅聪音乐艺术上的要求,点点滴滴的叮咛,一丝不苟的传授,使得傅聪终于在音乐上有所造诣。在后来的书信里,我甚至读出了他早年对儿子过于苛刻和不近人情的自责,读出了他的些许忏悔之意。

傅雷是一个细心的父亲,一个感情无边宽厚的父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文革”原因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傅雷去世时58岁,他生前留下大量的译著,留下了这本弥足珍惜的《傅雷家书》,也留下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傅雷家书》从1981年初版以来,历经数十次重印,称得上经久不衰了,它再一次向世人证明好的作品不仅“居于庙堂之高”,更“藏在江湖之远”的道理。

古文骈文皆自六经出,但骈文乃专学六经中骈偶的文字,并将之推行到极致,遂成一精致的艺术文体;古文则主实用,初无意于艺术。直到唐代韩愈出,始极力追求文章的“气”,学者宗尚之而成家,遂使古文成为骈文外中国文章的另一大宗。

以书法喻之,骈体文就像是艺术书法,其精要在笔法,也就是写好笔画的方法。而古文则像是实用书写,只要结体严谨,字自然写得好看。骈文讲究字句,多用换字、代字二法,正像艺术书法的重视笔画。所谓换字,是以新鲜的字换去陈旧的字,以美丽的字换去平常的字;所谓代字,是以表

●国文课

古文与骈文的修辞

徐晋如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不曰“季属三秋”,而曰“序属三秋”,即以序这个新鲜的字,换去了季这个陈旧的字。“序”字有出典:“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不曰“骖骖”,而曰“骖騑”,不曰“崇山”,而曰“崇阿”,皆是用新鲜之字换陈旧之字,这大概就是西方文论所常讲的“陌生化”的效果了。文中“潦水”“寒潭”“烟光”“暮山”

“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选用的都是美丽的字眼,这样就使得文章有了动人的情采。

而这篇名文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用彭蠡换掉了鄱阳,以与衡阳对仗,彭者大也,蠡者瓠瓢也,彭蠡本来只是大瓢的意思,用以形容鄱阳湖似一大瓢,这里就用来了原来的字;睢园指西汉梁孝王在睢阳建造的苑园,园中多绿竹,梁孝王常和能文善赋之客在此宴饮,这里就代指了滕王阁;彭泽则是地名代替了人名,指曾为彭泽令的陶渊明,他的《归去来辞》有“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之句;邺水朱华,邺水代指曹植,他曾在邺城写下《公宴诗》,中有“朱华冒绿池”之语;临川,代指曾官于临川的谢灵运。这样代用,便是骈文的代字法了。

古文也偶有用换字、代字之处,但并非必须,古文更重视的是通篇的结构,正如实用书法的重视结体。清末侯官吴曾祺认为,古文要讲究的是“纵横驰骋之势,精微要眇之思,演迤淡宕之观,沉郁顿挫之旨”(《涵芬楼文谈》自序),而古文的这些风格特征,都得靠结构而成事。因结构得当,而形成一定的体势,也就有了古文的行气。

害,他在《楚辞》

古诗文的“一字评”

成甬

文多有妙语,有些评论甚至只用一个字,就能把一位作家的作品

风格精准地概述出来。南宋学者李耆卿著有《文章精义》一书,其中有一句说:“《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汉书》气怯。”这都是很恰切的评论。孔子在《论语》中主要以一位教育家的面目出现,其中孔子的言论大都言简意赅、稳重平实,所以评之为气“平”。孟子则是一位雄辩家,言辞锐利,咄咄逼人,所以评之为气“激”。庄子颇具诗人气质,富有想象力,他的文章往往表现出新奇浪漫的情调,所以评之为气“乐”。屈原一生饱受迫

中的作品大都写得凄苦沉郁,所以评之谓气“悲”。司马迁具有过人的胆识,撰写的《史记》能勇于批评和揭露统治者,气“勇”当之无愧。班固所写《汉书》的批判精神远不如《史记》,有的地方还与《史记》持相反见解,自然就显得气“怯”了。

《文章精义》还有一句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这句话是用类喻的手法,以四种不同的水况来形容四种不同风格的文章:韩愈的文章风格雄阔,柳宗元的文章风格隽永,欧阳修的文章风格畅达,苏轼的文章风格浩荡。此句的评论可谓奇特精到。

时,罗新评价这位学者有几个特点,一是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对国际学界的诸多流行议题都有所回应,二是他深谙语文和语言的重要性,三是他的著作表面上没有理论的明显痕迹,却能在挑逗的细节里抓住读者。其实罗新也是如此。无论是谈论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还是那些带有普及性的文章,罗新的东西首先是“好看”,在小的问题细节上抓得很稳。好几篇文章把历史堆叠的层层岩石与观念剥离干净,有一种难得的审慎、冷静与克制。

●【美国】丹尼尔·斯通著《食物探险者》(张建国译)
书中的主角费尔柴尔德是一位跑遍全球的植物学家,曾为美国引进各种食用植物和水果不遗余力,从而改变了19世纪美国食品品种单一的情况。书中也讲到一些有趣的话题,例如,为何引进不结樱桃的樱桃树。

●汪曾祺著《聊斋新义》
《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十三则《聊斋志异》故事的改写,这是第一次出单行本。编辑在编排上颇为用心,书中还附有《聊斋志异》原文、于受万插图以及汪曾祺、蒲松龄手稿的影印图片。汪氏、蒲氏的小说都堪称佳作,比较阅读之下,两种文本背后的思想差异,很值得玩味。

黄庭坚的千古名句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多么普通的文字,没有一个动词,把他与朋友十年前相聚的欢乐和十年漂泊的寂寞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回味无穷。

当你静心阅读美妙的文字时,那一枚枚的“音符”,平平仄仄、抑扬顿挫,如金鸣玉振,如清泉击石,悦耳动听。有时它在你面前呈现的是一幅幅的图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读到这里,不觉身临其境,自己也成为画中人。

文字是有感情的。他与读者谈心、交流、倾诉、互动,听你哀伤的倾诉,解你迷茫的疑团,浇你郁结的块垒。

文字是有灵魂的,它若轻轻的风、绵绵的雨,它会慢慢氤氲、渗透每一位读者的心灵,并悄无声息地开出曼妙花朵。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后面,常常是一颗执着而善良的心。

文字的靈魂是頑強的,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歷史的鏡子。雖經受着時光的侵蝕,但它能隨春風吹拂而重生。

借书

陈汝洁

读书人借出书和借入书是常有的事情。我借过别人的书,别人也借过我的书;我拒绝过别人向我借书,别人也拒绝过我借他的书。

书有人读,是很好的事情。何以不借?还是举个例子吧。譬如说有位只贩书不读书的熟人,买到了线装《沧溟先生集》,持来寒舍让我看看,顺便告诉我他收书花了多少价钱。我被他说出的五位数字吓了一跳,只好告诉他寒斋已存齐鲁书社版《李攀龙全集》。临走,他要带走我的《李攀龙全集》,说是回去仔细校对一

下线装本与新印本到底有哪些不同。我拒绝,担心他将木刻的异体字与铅印繁体字的区别误认为是不一致,全标记在我的本子上。这书我经常使用。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铁云去海源阁看书,吃了闭门羹,大为不快,于是就写了“深锁琅嬛饱蠹鱼”的诗句,未免心酸太过。我去借别人的书,人家也有拒绝的。彼此都是爱书人,我自然也理解对方。

“终不肯下笔”

张宏

在旧书摊上翻看一本名人自传,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看来这位传主对自己的水平十分自信。

如今名人自传频见书市,其中充斥着自恋自夸的语调。以前很多人是不轻易写自传的。胡适曾到处劝朋友写自传,因为在当时,他“深深地感

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但“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金庸生前不肯写自传,他说:“自传有两种情况,一种全部是谎话,这种我不会写;还有一种就是实话实说,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鲁迅倒是写过一篇《自传》,但很简略,不足千字。

许多大家都没有留下自传,未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材料,也未能给传记文学开辟道路,但后世依然会记住他们。倒是那些吹嘘自己的传记,会有几个读者有兴趣看呢?

读书长德

张蓬云

读书,是为了有文化、长知识。但是,读书又可以多识字、明道理的功能也是不可小视的。比如“一琴一鹤”与“焚琴煮鹤”,初见确实眼生,一般成语词典里是没有的。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路边书摊花4角钱买了本《音乐与成语》,读后眼睛一亮,颇有收获。

原来“一琴一鹤”这个成语出自《宋史·赵抃传》。说的是古代文人学子们,都把“琴”与“鹤”视为高雅之物。宋朝时,赵抃去蜀地上任,行装十分简单,随身只带一个古琴、一只白鹤。宋神宗知道了,对他说:“闻卿匹马入川,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如是乎!”就是希望他为官办事,也要精兵简政,不贪财物,洁身自好。赵抃果然是个很能为百姓办事的清官。于是,后世人们便用“一琴一鹤”赞叹清正廉洁的好官品德。

“琴”与“鹤”被视为是清正廉洁的象征,为什么有人还“焚琴煮鹤”呢?原来世上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当官若不凭势而富,那可傻透了;公家的东西不捞点,岂不拿白不拿;至于,

道德规范,为民造福,亲民爱民,怎比得了豪宅三处,华车五辆,票子千万,美女满床好呢?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糟蹋中华传统美德。于是,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就出现了“焚琴煮鹤”这条成语。书中借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话说,世上这些损公肥私、道德丧尽的人呀,真是杀尽人间风景,他们就像那些“清泉濯足,花下晒裈(音:坤,裈裆之意),背山起楼,焚琴煮鹤”。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这些人呀,在人们饮用的清澈小溪里洗脚,在美丽的花坛前晾晒他的裈裆,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给老百姓建房子,把象征清正廉洁、人品中最宝贵的“琴”烧了,“鹤”煮了。细想想,是不是我们好像也见过这种人呢?

看,我们的前辈把人的品德看的多么重要。是啊,人无德怎立命。而这些品德是从哪儿得来的呢?还是先贤的书嘛。所以,读书即做人。读书多了,读懂了,也就知道该怎样为人处世了。

“神药”广告

肖伊绯

1910年、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之际,各类防疫“神药”纷纷应景借势,不惜重金在南北各大城市频登广告,鼓吹疗效,成为一道独特的都市风景线。

1911年6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就曾刊发了一份可防鼠疫、包治百病的所谓“清醒丸”的广告。这份广告的图样与文字内容,几乎占据半个版面,煞是醒目。广告词称其为“家家案上必备之金丹,人人囊中应有之珍品”,将其誉为“治瘟避疫之奇兵,急救祛秽之上将”,并煞有介事地标示“南京陆军军医官、慈惠医

院院长、医学博士张修爵鉴定”。在“清醒丸二十大功效”一栏中,更明确提到“鼠疫症现时,此丸可日服一次,每次五六丸,疫气自不能传染,因此丸善杀菌毒”。

此后数日,“清醒丸”广告常现报端,甚至跨年度宣传,至1912年仍在发布广告。姑且不论其疗效究竟如何,这样大张旗鼓的宣传,从医药商家迎合大众需求的层面上间接反映了上海社会各界对疫情开始有所关注,民众已然有了寻求预防疫病之药的心理。

与此同时,一些“洋药”也开始抢滩上海。1911年6月10日,日本药商制造的“藤井灵宝丹”开始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称“藤井灵宝丹为治鼠疫虱毒之良剂”。广告还明确声称,“鼠疫一症,其害最烈,朝发夕死,无药可援。去岁沪上受害者

甚夥,现虽沪上肃清,而东三省蔓延未净,夫欲除怪疾,必借良方,日本藤井仙鹿翁秘制之灵宝丹”。

“国药”与“洋药”,皆在上海疫情中应时而动,频频登场,以高频次的广告宣传自身疗效。除了“清醒丸”与“灵宝丹”,各类避疫药水、药片、药丸、药剂,层出不穷,纷纷面市,皆以“神药”自居。其疗效究竟如何,虽至今无从确证,但是从鼠疫血清与疫苗研制的医学史来考察,可以确知这些“神药”并无一种可以载入史册。

书人书事
故纸里的防疫往事之五

☐ 配合做好体温检测

☐ 不闲逛、不闲聊，减少逗留时间

☐ 提前列好购物清单

☐ 全程佩戴口罩

☐ 尽量步行、少乘坐厢式电梯

☐ 保持一米以上社交距离

☐ 提倡使用电子支付

☐ 到家后及时洗手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



(公益广告)